



学科综述

2016 年国际投资学综述

王碧珺 高琪*

【内容提要】 本文从6个方面梳理和评述了2016年国际投资学国内外研究动态：国际投资的决定因素、国际投资对母国的影响、国际投资对东道国的影响、国际投资的绩效、全球投资治理、海外利益保护和其他领域。其中，制度是决定因素研究中最主要的方向，对母国贸易的影响是国际投资母国效应研究的重点，对自然环境、生产率和贸易的影响是国际投资东道国效应研究的重点。

【关键词】 国际直接投资 影响 制度 绩效 治理 利益保护

2016年国际投资相关文献重点研究如下6个方向：国际投资的决定因素、国际投资对母国的影响、国际投资对东道国的影响、国际投资的绩效、全球投资治理以及海外利益保护。以下详细介绍、梳理和总结2016年上述主题的学术研究动态。

一、国际投资的决定因素

国际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分析的是影响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因素。有关国内外国际投资决定因素的文献大体可以归纳为如下四个方面。一是制度因素，包括母国制度因素和东道国制度因素，主要从金融发展水平、制度质量及制度距离、监管和税率制度、政治关系以及投资便利化等方面对其进行研究。二是企业生产率、经验及产业结构。其中对企业生产率的研究，主要从成本加成率和FDI的集聚技术溢出效应分析；对企业经验的研究，主要从企业出口经验和行业经验两方面分析；对产业结构的研究，主要从产业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分析。三是对外援助和FDI关联性。四是其他因素，包括企业ODI动因、东道国城镇化对FDI的影响、ODI的第三国效应以及地区经济集聚对FDI的影响。

（一）制度因素

制度因素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决定因素。

在母国制度方面，金融发展水平是学者考察的重要角度。杜思正等（2016）利用2006—

* 王碧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国际金融，wangbijun@cass.org.cn。高琪，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国际金融，gaoqitrista@126.com。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意见，自负文责。

2013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发现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高中国ODI水平。^①蒋冠宏、张馨月(2016)^②基于1970-2011年全球161个国家的数据,发现金融市场深化^③和证券市场规模促进了海外直接投资,但由于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发展的滞后性和不完全性,金融市场稳定性^④没有显著影响ODI。孙文莉等(2016)基于开放宏观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理论,研究了货币波动对中国ODI的影响。研究显示,本国货币波动性增强,将促进本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外国货币波动性增强,将阻碍本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⑤

在东道国制度方面,由于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较高的风险,为了降低风险,跨国企业往往选择制度质量较高的国家或地区。Zhang et al. (2016)基于交易成本经济学和产权理论模型,研究了风险对外国投资者选择股份比例的影响。研究表明,当合同风险增加时,外国投资者倾向于选择较高的股份来避免被国内合伙人制压。当政治风险增加时,他们倾向于选择较低的股份来避开政府的攫夺。^⑥Azzimonti (2016)发现政治不稳定性增加了投资风险,减少了FDI流入。^⑦Azzimonti (2016)使用1985-2015年季度数据,发现党派冲突指数(PCI)的增加与FDI流入美国的显著下降密切相关。^⑧姚耀军(2016)^⑨利用中国各省政府廉洁指数和司法公正与效率指数,用县域人口规模^⑩和矿产资源丰裕度^⑪作为工具变量,发现减少腐败来提升制度质量有利于吸引外资银行进入。

然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大量分布于风险较高的国家,具有“风险偏好”特征。王永中、赵奇锋(2016)利用2004-2013年中国对115个国家的ODI数据,使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发现中国与风险较高的国家体制环境相似、有较好的政经关系,能够获得更好的投资机会并获得竞争优势。^⑫杨娇辉等(2016)则认为“制度风险偏好”的形成主要是由于中国

① 杜思正、冼国明和冷艳丽(2016):“中国金融发展、资本效率与对外投资水平”,《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10期,第17-36页。

② 蒋冠宏、张馨月(2016):“金融发展与对外直接投资——来自跨国的证据”,《国际贸易问题》,第1期,第166-176页。

③ 作者用私人部门信贷与GDP的比值及流动性负债与GDP的比值来衡量金融深度,这两个指标越大,则金融深度越高。

④ 用Z值来表示金融市场稳定性,其中Z值用银行资产回报的均值与股权资产比之和占银行资产回报的标准差的比重来衡量,Z值越大,则金融市场越稳定。

⑤ 孙文莉、余靖雯和伍晓光(2016):“货币波动性对中国ODI的诱发机制研究”,《经济学(季刊)》,第4期,第1581-1602页。

⑥ Zhang, Y., Fang, M., Jiang, T. & Nie, H. (2016). Contractual Hazard, Political Hazard and FDI Ownership Structure in Joint-venture Enterprises in China.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 (1), 14-24.

⑦ Azzimonti, M. (2016). The Politics of FDI Expropriation. *NBER Working Paper No. 22705*.

⑧ Azzimonti, M. (2016). Does Partisan Conflict Deter FDI Inflows to the US? *NBER Working Paper No. 22336*.

⑨ 姚耀军(2016):“制度质量对外资银行进入的影响——基于腐败控制维度的研究”,《金融研究》,第3期,第124-139页。

⑩ 地区人口数量与地区所管辖县级行政区域的数量之比表示县域人口规模。

⑪ 从事采掘业人员数与总人口的比值。

⑫ 王永中、赵奇锋(2016):“风险偏好、投资动机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面板数据的分析”,《金融评论》,第4期,第1-17、124页。



ODI 更多地流向自然资源丰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或地区。^① 但是, 也有学者发现中国 ODI 也倾向流入制度环境更好的国家和地区。闫雪凌、胡阳 (2016) 基于 2004 - 2012 年中国对外投资的跨国面板数据, 发现完善的东道国制度环境 (主要是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 会吸引中国 ODI 的进入; 文化异质性 (基因距离和宗教距离) 会阻碍中国 ODI 的流入。^②

东道国的监管制度对国际直接投资产生重要影响。出于监管套利, 一般而言监管放松有利于吸引 FDI。在金融监管方面, Kandilov et al. (2016) 分析了放松银行管制对在美投资的外国公司的影响。银行放松管制使得美国取消对银行扩张的限制, 这为跨国公司提供了更加宽松的融资环境, 从而增加了跨国公司的进入和交易次数。研究发现, 随着美国银行放松管制, 更多依赖外部融资行业的 FDI 进入率会显著增加。^③ 在环境监管方面, Cai et al. (2016) 通过使用 1998 年中国政府实施的“两个控制区”政策来研究环境监管对 FDI 的影响。研究表明, 城市环境监管的严格程度与 FDI 的流入量呈反向变化。^④

东道国的税率制度影响跨国公司投资决策。跨国公司倾向于投资税率较低的国家, 以降低交易成本, 增加竞争优势。跨国公司的避税动机随潜在投资地区税率的下降而增加: 国外非避税地税率每增加 1%, 制造业企业拥有避税分支机构的可能性增加 2.3%; 而税率与服务企业的避税投资没有显著关系 (Gumpert et al., 2016)。^⑤

制度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不仅体现在绝对制度质量方面, 也体现在相对制度质量, 即制度距离方面。一般而言, 制度距离对国际投资者形成进入壁垒。Guardo et al. (2016) 基于 2000 - 2011 年间 27 个欧盟国家和 16 个欧洲邻国间的跨国并购交易指出, 文化、政治以及空间距离都对并购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⑥ Demir & Hu (2016) 发现制度差异这一进入壁垒只存在于南北合作中。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者在与其制度不同的发展中国家投资具有比较优势, 因此南南合作不断增加。^⑦ Blonigen & Lee (2016) 发现非制造业对包括物理距离、文化距离和共同语言在内的跨国并购摩擦的敏感度高于制造业。^⑧

制度距离有不同的衡量指标, 不同类型的制度距离对于国际直接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史伟等 (2016) 基于 2013 年零售企业全球 250 强中的 82 家具有实体店跨国经营活动的企业数

① 杨娇辉、王伟和谭娜 (2016): “破解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制度风险偏好’之谜”, 《世界经济》, 第 11 期, 第 3 - 27 页。

② 闫雪凌、胡阳 (2016): “制度、文化与中国 ODI 的利益动机”, 《南方经济》, 第 6 期, 第 1 - 17 页。

③ Kandilov, v. T., Leblebiciolu, A. & Petkova, N. (2016). The impact of banking deregulation on inbou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ransaction-level eviden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Stat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00, 138 - 159.

④ Cai, X., Lu, Y., Wu, M. & Yu, L. (2016). Doe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drive away inbou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in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23, 73 - 85.

⑤ Gumpert, A., Hines, J. R. & Schnitzer, M. (2016). Multinational Firms and Tax Haven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8 (4), 713 - 727.

⑥ Guardo, M. C., Marrocu, E. & Paci, R. (2016). The Concurrent Impact of Cultural, Political, and Spatial Distances on International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The World Economy*, 39 (6), 824 - 852.

⑦ Demir, F. & Hu, C. (2016).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s and the Direction of Bilateral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lows: Are South-South Flows any Different than the Rest? *The World Economy*, 39 (12), 2000 - 2024.

⑧ Blonigen, B. A. & Lee, D. (2016). Heterogeneous Frictional Costs Across Industries in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NBER Working Paper No. 22546*.

据,从经济距离、文化距离、商业治理距离和地理距离四个维度进行实证分析,研究了不同维度制度距离对跨国零售企业东道国进入决策的不同影响。研究发现,零售企业倾向在与其文化距离、地理距离、商业距离较小的东道国进行跨国经营,而经济距离则没有显著影响。进一步研究在正向(企业向经济发展水平较强的国家扩张)和负向(企业向经济发展水平较弱的国家扩张)两种不同扩张方向下,经济距离、商业距离对跨国零售企业进入东道国的决策产生不同影响。具体来说,零售企业倾向于选择经济发展水平比母国低的国家进行跨国经营,而倾向于选择进入商业治理水平比母国高的国家进行跨国经营。^①

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有利于弥补东道国制度环境的不足,减少海外投资的不确定性风险,从而促进企业海外投资。刘晓光、杨连星(2016)基于2005-2014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微观企业层面数据,发现友好的双边政治关系对较差东道国制度环境有较强的互补效应,从而促进企业海外投资。^② 郭焯、许陈生(2016)基于2003-2013年面板数据,使用面板校正误差模型,研究了双边高层会晤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影响。作者分别考察了国家主席的出访、接待来访和工作会晤以及国务院总理的出访、接待来访和工作会晤,发现不同类型的高层会晤存在异质性,其中,出访的作用最大且最显著。^③

投资便利化措施有利于降低投资成本,并为企业创造更加开放、透明和便捷的投资环境,以学术界普遍认为投资便利化能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张亚斌(2016)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进行了测度,并利用引力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投资便利化对中国ODI有显著促进作用,并且对东南亚等欠发达地区的促进效果更加明显。^④ 袁其刚等(2016)检验了《对外投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政策的有效性,发现鼓励政策能够促进对中国企业ODI。^⑤

(二) 企业生产率、经验及产业结构

企业只有具备一定的优势,才能克服在异国生产经营的劣势。拥有较高的生产率是企业具备的首要优势。邱立成等(2016)基于2003-2007年中国企业层面数据,从成本加成率角度考察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和非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异质性。作者指出成本加成率主要由企业的产品定价优势和生产率优势决定。实证结果显示,相对于非对外投资企业,中国对外投资企业整体上具有更高的成本加成率,并且高成本加成率对应着高对外投资规模。^⑥

① 史伟、李申禹和陈信康(2016):“国家距离对跨国零售企业东道国选择的影响”,《国际贸易问题》,第3期,第117-127页。

② 刘晓光、杨连星(2016):“双边政治关系、东道国制度环境与对外直接投资”,《金融研究》,第12期,第17-31页。

③ 郭焯、许陈生(2016):“双边高层会晤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国际贸易问题》,第2期,第26-36页。

④ 张亚斌(2016):“‘一带一路’投资便利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选择——基于跨国面板数据及投资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国际贸易问题》,第9期,第165-176页。

⑤ 袁其刚、朱学昌、王玥(2016):“《对外投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对企业ODI行为的影响及其生产率效应的检验”,《国际贸易问题》,第6期,第116-129页。

⑥ 邱立成、刘灿雷和杨德彬(2016):“中国对外投资企业具有更高的成本加成率吗——来自制造业企业的经验证据”,《国际贸易问题》,第12期,第3-15页。

企业生产率的提高还可能来自 FDI 的集聚技术溢出效应。聂飞等 (2016) 构建含集聚经济和 ODI 模型决定方程的联立方程模型, 并利用中国 30 个省份在 2003 - 2013 年间制造业面板数据进行 3SLS 估计, 发现 FDI 的集聚技术溢出效应对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有着正向促进作用, 并且这一效应在发达地区更明显。^①

企业 ODI 的市场竞争力不仅来源于生产率, 而且来源于经验。现有文献从出口经验和行业经验两方面进行了考察。出口经验方面, 张先锋等 (2016) 利用 2005 - 2007 年的出口企业数据, 发现出口学习效应对中国 ODI 有正向促进作用。^② Conconi et al. (2016) 基于在比利时注册公司的数据, 发现跨国企业投资国外市场的可能性随着该国出口经验的增加而增加, 并且当跨国企业投资于市场条件更不确定的国家或地区时, 出口经验更为重要。^③ 行业经验方面, 吴亮等 (2016) 利用 2000 - 2010 年中国沪市上市的母子公司数据样本, 将行业经验分为自身子公司行业经验、其他母公司行业经验和其他子公司行业经验三种, 实证分析了行业经验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步伐的影响。研究显示, 自身子公司行业经验能加快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步伐, 其他母公司行业经验以及其他子公司行业经验会减缓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步伐。对不同行业进一步研究发现, 与服务业对比, 中国制造业海外投资主要集中在初级产品加工地, 面临的市场竞争相对较小, 并且制造业企业往往有较大的资金规模, 使得企业海外经验得到充分发挥, 因此制造业企业的其他子公司行业经验更能加快自身子公司海外投资步伐。^④

除了经验和生产率以外, 母国产业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均对 ODI 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李洪亚 (2016) 使用 2003 - 2014 年中国对 187 个国家 (地区) 的面板数据, 发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通过使 ODI 行业构成发生变化 (从第一、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型升级) 来推动 ODI 扩张。^⑤ 官汝凯、李洪亚 (2016) 认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通过经济增长带动 ODI 的扩张有两种正效应和一种负效应。正效应分别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技术进步相互作用推动 ODI 扩张, 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使企业转移落后产能从而推动 ODI 扩张。负效应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增加了国内投资机会, 从而挤出 ODI。产业结构调整对 ODI 的具体影响取决于两个不同方向效应相抵消后的净效应。作者使用 2003 - 2012 年中国对 176 个国家 (地区) 的 ODI 数据, 发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 ODI 的扩张有积极作用。^⑥ 肖文、韩沈超 (2016) 使用 2003 - 2013 年省级面板数据, 发现产业结构优化与中国 ODI 之间存在互动效应, 两者之间存在正向

① 聂飞、刘海云和毛海欧 (2016): “中国利用外资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吗——基于集聚经济效应的实证研究”, 《国际贸易问题》, 第 10 期, 第 119 - 130 页。

② 张先锋、张杰和刘晓斐 (2016): “出口学习效应促进 ODI: 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 《国际贸易问题》, 第 4 期, 第 155 - 165 页。

③ Conconi, P., Sapir, A. & Zanardi, M. (2016).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of firms: From exports to FDI.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99, 16 - 30.

④ 吴亮、刘曦子和殷华方 (2016): “小步慢走还是大步快跑——行业经验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步伐的影响”, 《财贸经济》, 第 10 期, 第 117 - 131 页。

⑤ 李洪亚 (2016): “产业结构变迁与中国 ODI: 2003 - 2014 年”,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第 10 期, 第 76 - 93 页。

⑥ 官汝凯、李洪亚 (2016): “技术进步、经济结构转型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基于 2003—2012 年的证据”, 《南开经济研究》, 第 6 期, 第 56 - 77 页。

促进作用。^①

（三）对外援助

国内外文献从援助的视角，对企业海外投资行为进行了分析。现有文献对援助和 FDI 关联性的研究相对较少，结论并未达成一致。Lee & Ries (2016) 使用 2003 - 2013 年间 25 个捐助国和 120 个受援国的双边数据进行研究，结果显示，援助尤其是针对基础设施和建设生产能力的援助促进了 FDI 的流入。^② Donaubauer et al. (2016) 发现援助有助于发展中国家通过改善运输、通讯、能源和金融基础设施来吸引更多 FDI 流入。^③

然而，援助对国际投资的影响可能并不是一个线性关系，并且不同类型的援助产生的影响也不尽相同。董艳、樊此君 (2016) 利用 47 个非洲国家在 2003 - 2011 年间的的面板数据，使用分位数回归法和系统 GMM 估计，考察了中国对非援助对在非投资的影响。作者根据援助流向的领域将其分为社会基础设施、经济基础设施、东道国政府以及生产性部门的实物资本四大类。其中社会基础设施部门的援助指教育、水供给、健康等。经济基础设施部门的援助指能源、交通、运输等。生产性部门的实物资本援助指制造业、银行、贸易、农业、金融服务、旅游等。政府援助指政府对外的财政支持。作者发现投向社会基础设施部门的援助对中国对非投资的增长有加速促进作用。投向经济基础设施部门的援助与投资呈倒“U”型趋势。直接流向非洲政府和生产性部门的援助对其投资的影响呈“U”型趋势。^④

（四）其他

ODI 的动机。吴先明、黄春桃 (2016) 通过比较逆向投资（对发达国家）与顺向投资（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研究了中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后发现，不论是逆向投资还是顺向投资，强烈的市场寻求动因和自然资源动因导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⑤

城镇化进程对就业和工业化以及城镇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均产生重要影响，带来巨大的投资机会。东道国城镇化有利于吸引外资。邱立成等 (2016) 使用中国对 158 个国家或地区在 2003 - 2013 年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在城镇化较高或较低的阶段中国 ODI 机会较少，而在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投资机会较多。因此中国跨国企业应该将本国比较优势弱化的产业和过剩产能在东道国快速城镇化阶段转移出去。^⑥

① 肖文、韩沈超 (2016): “产业结构调整速率对 ODI 的静态影响与动态效应——基于 2003 - 2013 年省级面板数据的检验”, 《国际贸易问题》, 第 11 期, 第 108 - 119 页。

② Lee, H. & Ries, J. (2016). Aid for Trade and Greenfield Investment. *World Development*, 84, 206 - 218.

③ Donaubauer, J., Meyer, B. & Nunnenkamp, P. (2016). Aid, Infrastructure, and FDI: Assessing the Transmission Channel with a New Index of Infrastructure. *World Development*, 78, 230 - 245.

④ 董艳、樊此君 (2016): “援助会促进投资吗——基于中国对非洲援助及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 《国际贸易问题》, 第 3 期, 第 59 - 69 页。

⑤ 吴先明、黄春桃 (2016):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 逆向投资与顺向投资的比较研究”, 《中国工业经济》, 第 1 期, 第 99 - 113 页。

⑥ 邱立成、刘奎宁和王自锋 (2016): “东道国城镇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国际贸易问题》, 第 4 期, 第 143 - 154 页。

“第三国效应”在国际直接投资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国内学者对于第三国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于 FDI, 关于 ODI 第三国效应的研究很少。马述忠、刘梦恒 (2016) 运用空间面板模型, 使用 2003 - 2014 年 42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发现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ODI 存在第三国效应。具体而言, 第三国的市场规模越大, 中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就越小, 即第三国市场对中国在东道国的 ODI 存在挤出效应。同时, 中国在第三国 ODI 对中国在东道国的 ODI 也会产生显著的挤出效应。^①

外国投资者由于对东道国地理环境、制度、文化等缺乏充分了解, 面临外来者劣势。张宇婷等 (2016) 基于外来者劣势理论和集聚经济理论, 利用 2006 - 2013 年间 26 个国家或地区的 500 家外国子公司在中国 22 个省份 20 个制造业二位数细分行业进行投资的数据, 实证检验了地区经济集聚对外来者劣势的影响。结果显示, 地区专业化集聚与外来者劣势间呈现显著的“倒 U 型”关系, 地区多样化集聚与外来者劣势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②

二、国际投资对母国的影响

国际投资对母国的影响指对外直接投资对投资来源国的影响。2016 年这方面的文献主要从国内贸易、企业生产率、产业升级以及就业、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风险等方面进行研究。其中, 国际投资对母国贸易的影响是关注的重点, 学者从出口规模、出口产品质量、成本加成率和贸易结构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一) 贸易

ODI 与出口是跨国公司拓展海外市场的两种重要方式, 文献从出口规模、出口产品质量、成本加成率和贸易结构四个方面, 研究了 ODI 对出口的影响。

1. ODI 对出口规模的影响。刘海云、毛海欧 (2016) 使用 2003 - 2011 年中国对澳大利亚等 19 个国家的 ODI 和出口数据, 分析了中国制造业 ODI 对出口增加值的影响。结果显示, 中国制造业的垂直和水平 ODI 促进出口增加值的提升, 其中垂直 ODI 的促进作用更显著。^③然而林志帆 (2016) 通过修正模型设定、变量选取和估计方法, 并使用 2003 - 2014 年中国 ODI 与出口贸易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否定了 ODI 可以促进出口贸易的论断。作者发现, 总体上中国 ODI 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是相对较小的。其中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对出口存在轻微替代关系。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对出口存在轻微促进关系。ODI 与母国出口的关系还受到国家间产业结构差异的影响。^④顾雪松等 (2016) 基于 2003 - 2011 年中国对 108 个东道国投资的面板数据, 从理论层面和实证层面考察了产业结构差异对 ODI 的出口效应的影响。

① 马述忠、刘梦恒 (2016):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ODI 的第三国效应研究: 基于空间计量方法”, 《国际贸易问题》, 第 7 期, 第 72 - 83 页。

② 张宇婷、王增涛和蒋云龙 (2016): “地区经济集聚对外来者劣势的影响——基于 500 家在华跨国子公司的分析”, 《国际贸易问题》, 第 7 期, 第 109 - 118 页。

③ 刘海云、毛海欧 (2016): “制造业 ODI 对出口增加值的影响”, 《中国工业经济》, 第 7 期, 第 91 - 108 页。

④ 林志帆 (2016):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真的促进出口吗”, 《财贸经济》, 第 2 期, 第 100 - 113 页。

作者发现,母国与东道国间产业结构差异的扩大,带来 ODI 对母国的出口创造效应增强。^①

2. ODI 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景光正、李平(2016)根据企业投资动机,将 ODI 对母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机制分为四个效应。一是技术反馈效应,母国通过 ODI 获得国际技术溢出来提升出口产品质量。二是市场深化效应。由于国际市场上的多样化需求,母国增加新产品的研发带来国内需求的增加,从而深化了国内市场,提升出口产品质量。三是资源配置效应。母国通过 ODI 获取优质低价资源和先进资源,利用技术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四是产业升级效应。母国通过 ODI 将国内落后产业转移出去和延伸企业产业价值链带来升级产业,从而提升出口产品质量。^②

3. ODI 对成本加成率的影响。毛其淋、许家云(2016)利用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生产和贸易数据,发现 ODI 显著提高了企业加成率,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促进作用呈递增趋势。不同投资目的和经营类型的 ODI 对企业加成率的影响具有异质性。作者发现,相比投资于中低收入国家,投资于高收入国家对企业加成率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研发加工型和多样化型 ODI 通过提高企业成本加成定价能力,显著提升了企业加成率。而企业成本加成定价能力的提高可以通过“生产效率”和“新产品创新”的提升两个渠道实现。^③成本加成率的提高进而改善母公司的经营绩效(邱立成等,2016)^④。但 ODI 通过竞争加剧效应、成本增加效应也有可能降低企业加成率(诸竹君等,2016)^⑤。

4. ODI 有助于加速中国贸易结构转型升级。刘海云、毛海欧(2016)发现水平型 ODI 通过提升母国出口增加值中生产性服务业占比,降低资源行业增加值占比,优化了中国制造业出口增加值结构。垂直型 ODI 促进了生产性服务业占比提升,其中对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占比提升的促进作用显著,改善了中国制造业出口增加值的结构,从而促进了贸易结构转型。^⑥杨连星、刘晓光(2016)构建了一个双重异质企业贸易模型,并利用 2003-2010 年中国 ODI 与出口的产品层面与行业层面数据,发现 ODI 逆向技术溢出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有促进作用,其中对部分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⑦

(二) 生产率

现有不少文献对 ODI 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进行了相关研究。大部分研究

① 顾雪松、韩立岩、周伊敏(2016):“产业结构差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中国—东道国’视角的理论与实证”,《经济研究》,第4期,第102-115页。

② 景光正、李平(2016):“ODI 是否提升了中国的出口产品质量”,《国际贸易问题》,第8期,第131-142页。

③ 毛其淋、许家云(2016):“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了企业加成率:事实与机制”,《世界经济》,第6期,第77-99页。

④ 邱立成、刘灿雷、盛丹(2016):“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公司经营绩效——基于成本加成率的考察”,《世界经济文汇》,第5期,第60-75页。

⑤ 诸竹君、黄先海、宋学印(2016):“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加成率提升吗?”,《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6期,第77-93页。

⑥ 刘海云、毛海欧(2016):“制造业 ODI 对出口增加值的影响”,《中国工业经济》,第7期,第91-108页。

⑦ 杨连星、刘晓光(2016):“中国 ODI 逆向技术溢出与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财贸经济》,第6期,第97-112页。

发现中国 ODI 存在显著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了本国企业生产率的提高。齐亚伟(2016)基于 2005-2007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发现 ODI 通过学习效应对企业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①李思慧、于津平(2016)基于高新技术企业的微观数据,发现 ODI 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较强。但相对于自主创新,ODI 企业更加倾向于模仿创新,导致其创新投入增加而创新产出相对不足,降低了企业创新效率。^②

ODI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实现依赖于企业的吸收能力。尹东东、张建清(2016)基于 2003-2012 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 GMM 估计,并没有发现显著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作者认为这主要是与中国企业吸收能力相关。于是将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水平、资本存量、对外开放程度、金融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作为吸收能力的衡量因素,发现吸收能力对 ODI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实现有积极促进作用,使该效应得以产生。^③

学者进一步从行业、地区和企业微观特征,分析了逆向溢出效应的异质性。叶娇、赵云鹏(2016)基于 2005-2007 年《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动态估计法,研究发现:从行业类型来看,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最强的是机械电子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其次是资源加工业,最弱的是轻纺制造业。从地区来源来看,西部地区的 ODI 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东部地区,中部地区最弱。从企业生产率的不同来看,较高生产率和较低生产率水平的企业的 ODI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较强,而中间生产率水平的企业 ODI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较弱。从企业的其他微观特征来看,企业利润率和研发投入促进了 ODI 的逆向技术溢出。^④严兵等(2016)以江苏省 2003-2007 年的企业层面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 ODI 都显著提升了企业生产率,而国有企业效果更为显著。非出口企业 ODI 有显著的生产率提升效应,而出口企业则没有。有研发投入的企业 ODI 使母国生产率显著提高,而没有研发投入的企业没有。^⑤

跨国并购是 ODI 的重要形式,杨德彬(2016)基于 2005-2008 年 193 家中国工业企业层面数据,发现跨国并购显著提高了企业生产率。从企业的吸收能力来看,吸收能力越强的企业,生产率效应越显著;从母国企业类别来看,非国有企业的生产率通过跨国并购能显著提高,而跨国并购对国有企业的生产率提升效应不显著;从东道国类型来看,对发达国家的跨国并购,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明显大于对发展中国家的并购。^⑥Stiebale(2016)分析了跨国并

① 齐亚伟(2016):“研发创新背景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研究”,《国际贸易问题》,第 2 期,第 111-121 页。

② 李思慧、于津平(2016):“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创新效率”,《国际贸易问题》,第 12 期,第 28-38 页。

③ 尹东东、张建清(2016):“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基于吸收能力视角的实证分析”,《国际贸易问题》,第 1 期,第 109-120 页。

④ 叶娇、赵云鹏(2016):“对外直接投资与逆向技术溢出——基于企业微观特征的分析”,《国际贸易问题》,第 1 期,第 134-144 页。

⑤ 严兵、张禹、李雪飞(2016):“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生产率效应——基于江苏省企业数据的检验”,《南开经济研究》,第 4 期,第 85-98 页。

⑥ 杨德彬(2016):“跨国并购提高了中国企业生产率吗——基于工业企业数据的经验分析”,《国际贸易问题》,第 4 期,第 166-176 页。

购对欧洲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同样发现跨国并购会带来母国企业创新活动大幅增加。^①

除了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外,ODI也会对企业公司治理产生影响。赵海龙等(2016)通过对2002-2011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数据进行分析,作者发现中国跨国公司进行海外并购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持股比例显著增加,倾向于选择大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来审计,董事长总经理两职合一明显下降,持有的现金减少,并且并购后的公司投资效率得到了提升,公司治理得到了改善。^②

(三) 产业升级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产业升级产生影响。尹斯斯、高云舒(2016)将二次拟线性效用函数运用到研究中,构建了一个附加企业ODI的开放经济模型,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加剧母国的市场竞争,增加市场潜在进入者,并且使得产品更加多样化,社会福利更大。^③

投资类型、动机和东道国区位的不同使得ODI对母国产业升级的影响具有差异性。杨亚平、吴祝红(2016)利用倾向性匹配法为2003-2008年1273家开展ODI的制造业企业提供可供比较的样本数据,采用倍差法发现,商贸服务型ODI通过加强出口以促进中国制造业结构升级、产能优化和技术效率提升。而当地生产型ODI,特别是针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及投向中低收入国家的ODI,带来了结构性“去制造业”,对母国企业的投资、出口产生“挤占效应”。投入高收入国家的技术研发型ODI,短期内对母公司的生产不会带来明显影响,长期内会促进母公司的经济活动。^④贾妮莎、申晨(2016)利用马氏距离匹配法为2005-2007年522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制造业企业提供可供比较的对照组,采用倍差法进行实证发现,ODI显著提高了中高端技术企业的市场份额,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促进制造业产业升级,但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未显著提升制造业产业。^⑤

对于地区差异显著、地域广袤的中国而言,地理空间因素对ODI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有重要影响。李东坤、邓敏(2016)^⑥基于2004-2013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从产业结构合理化^⑦和高度化^⑧两个层面研究O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后发现,本地ODI的发展提升了本地和其他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但对产业结构高度化

① Stiebale, J. (2016). Cross-border M&As and innovative activity of acquiring and target firm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99, 1-15.

② 赵海龙、何贤杰、王孝钰和严媛芝(2016):“海外并购能够改善中国企业公司治理吗?”,《南开管理评论》,第3期,第31-39页。

③ 尹斯斯、高云舒(2016):“ODI、市场竞争强度与国际贸易”,《国际贸易问题》,第5期,第153-163页。

④ 杨亚平、吴祝红(2016):“中国制造业企业ODI带来‘去制造业’吗——基于微观数据和投资动机的实证研究”,《国际贸易问题》,第8期,第154-164页。

⑤ 贾妮莎、申晨(2016):“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制造业产业升级效应研究”,《国际贸易问题》,第8期,第143-153页。

⑥ 李东坤、邓敏(2016):“中国省际ODI、空间溢出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国际贸易问题》,第1期,第121-133页。

⑦ 产业结构合理化反映了资源配置效率、产业结构的聚合质量以及产业间的协调程度。

⑧ 产业结构高度化反映了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水平,作者将第二、三产业的产值之比和高新技术产业产值之比进行加权平均,来作为衡量一国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指标。

的作用不显著。

(四) 就业、经济增长和风险

现有文献普遍发现 ODI 有助于促进中国国内就业。李磊等 (2016) 首先从理论上将 ODI 分为水平当地生产型、垂直当地生产型、研究开发型、资源寻求型和商贸服务型五种, 分析在不同投资动机下, ODI 对母国就业的影响机制。作者随后利用 2000 - 2013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境外投资企业 (机构) 名录》、《中国海关数据库》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发现中国企业 ODI 显著促进母国就业, 并且随着投资次数增多, 对国内就业的促进作用越明显, 并且 ODI 对就业的促进作用不受所有制类型、东道国收入水平、投资动机的影响。^① 蒋冠宏 (2016) 基于 2005 - 2007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 发现现阶段 ODI 对本国就业有显著促进作用, 但 ODI 的“就业效应”呈现倒“U”型趋势。从投资动机来看, 商贸服务型 ODI 对本国就业的促进作用最显著。从国家类型来看, 投资于高收入国家对本国就业的促进作用显著, 而对中低收入国家的投资则没有显著的“就业效应”。^②

ODI 对母国贸易、企业生产率、就业和产业升级普遍有正面促进作用, 并进一步反馈到经济增长上面。潘雄锋等 (2016) 将 ODI、经济增长与技术创新三者纳入同一框架, 提出三者之间的三条传导路径。一是 ODI 通过扩展海外市场和参与海外资源的生产与开发从而直接促进母国经济增长。二是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带来技术创新, 从而间接促进母国经济增长。三是通过竞争效应增加研发经费, 从而间接促进母国经济增长。^③

ODI 对母国经济有多方面益处, 但仍然要注意大规模 ODI 对母国宏观经济的风险。如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剧、冲击工业化进程、制约人民币国际化、诱发产业空心化等 (桑百川, 2016)。^④

三、国际投资对东道国的影响

2016 年国际投资对东道国的影响的研究文献主要从自然环境、生产率和贸易、劳动力市场和社会福利以及投资与增长四个方面进行探讨。其中国际投资对东道国的自然环境、生产率和贸易的影响是研究的重要关注点。

(一) 自然环境

现有研究对 FDI 在东道国的环境效应主要有二种假说。一是“污染天堂”假说。为了吸引外资流入, 东道国会放松环境管制标准、加大资源开发力度以及生产更多污染密集型产品,

① 李磊、白道欢、冼国明 (2016): “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了母国就业? ——基于中国微观企业数据的研究”, 《经济研究》, 第 8 期, 第 144 - 158 页。

② 蒋冠宏 (2016):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 《统计研究》, 第 8 期, 第 55 - 62 页。

③ 潘雄锋、闫竊博、王冠 (2016): “对外直接投资、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传导路径研究”, 《统计研究》, 第 8 期, 第 30 - 36 页。

④ 桑百川 (2016): “防范对外直接投资高速增长的宏观经济风险”, 《国际经济评论》, 第 4 期, 第 67 - 76、5 - 6 页。

导致环境污染加剧。二是“污染光环”假说。外资流入过程中会使用先进清洁技术以及与母国统一的环境标准，从而改善东道国的环境。

也有部分学者提出，FDI 在东道国的环境效应并不确定，与污染类型和投资地区有关。刘飞宇、赵爱清（2016）基于中国 285 个城市 2003 - 2012 年间的面板数据，使用空间自相关模型，发现 FDI 的引入同时具有“污染天堂”和“污染光环”效应。作者区分不同污染源和地区，发现 FDI 的引入对于中国部分传统环境污染的治理有改善作用，但对于工业烟尘的排放却有加剧作用。东部地区 FDI 对工业废水和二氧化硫的治理效果最为显著，对工业烟尘的污染排放有较弱的增加作用。中部地区的 FDI 对三种污染源的排放有促进作用。西部地区的 FDI 对三种污染源排放的抑制作用强于中部地区，弱于东部地区。^①

数据的时间段、环境规制、与 FDI 相关的投入研发和产业结构变量等是造成 FDI 在东道国的环境效应并不确定的重要因素（刘叶等，2016）^②。产业集聚则是另一个研究视角，其不仅通过规模效应和拥挤效应加剧环境污染，也可以通过技术进步、技术溢出及竞争效应降低环境污染。许和连、邓玉萍（2016）基于 2001 - 2010 年中国制造业 36 个细分行业面板数据，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 FDI 与产业集聚互动作用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以及带来的策略性减排竞争。结果表明，中国行业污染排放存在一定的策略性竞争，行业间的污染排放并不是相互独立的。主要体现在经济属性相似的行业间存在明显的减排竞争效应，技术结构相似的行业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排污攀比效应。在控制 FDI 与产业集聚的交互作用后，作者还发现 FDI 的引入明显降低了行业污染排放强度，产业集聚进一步强化了 FDI 的减排溢出效应。^③除了比较行业排放外，邓玉萍、许和连（2016）还对 ODI 与集聚外部性的交互作用对地区环境污染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④

（二）生产率和贸易

产业组织理论、国际贸易理论以及内生增长理论认为，FDI 可以通过竞争效应、示范效应以及改变东道国经济环境等效应对东道国企业生产率产生正向溢出。但是这些效应的发挥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使得 FDI 对东道国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是复杂的。国内外已有大量文献对此进行相关研究，结果并不一致。Jude（2016）基于 1999 - 2007 年罗马尼亚企业层面数据，把水平溢出效应分为三种。一是竞争效应。FDI 进入东道国增加了市场竞争，迫使国内企业采用新技术和提高生产率。二是示范效应。国内企业通过模仿、学习 FDI 企业的方式提高生产率。三是劳动力流动效应。FDI 进入带来了高素质劳动力，提高企业生产率。进一步的实证检验发现，在市场竞争不激烈、通过示范效应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的情况下，

① 刘飞宇、赵爱清（2016）：“外商直接投资对城市环境污染的效应检验——基于中国 285 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国际贸易问题》，第 5 期，第 130 - 141 页。

② 刘叶、贺培和林发勤（2016）：“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环境效应实证研究的元分析”，《国际贸易问题》，第 11 期，第 132 - 142 页。

③ 许和连、邓玉萍（2016）：“外商直接投资、产业集聚与策略性减排”，《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 9 期，第 112 - 128 页。

④ 邓玉萍、许和连（2016）：“外商直接投资、集聚外部性与环境污染”，《统计研究》，第 9 期，第 47 - 54 页。

生产率无法得到提高,但是本地企业可以通过雇佣外国公司员工来提高生产率。^①

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是 FDI 进入的两种重要模式。Ashraf et al. (2016) 基于 2003 - 2011 年 123 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发现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对发展中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没有影响,而跨国并购对发达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有积极促进作用。然而,也有研究发现 FDI 不利于东道国企业的创新和生产率的提高。^② Hong et al. (2016) 利用 1998 - 2007 年中国制造业的数据,发现 FDI 对中国国内企业的生产率产生了负面影响。外资机构较多的地区由于生产收缩、劳动成本增加及创新限制,受到国外的影响较大。^③ Stiebale (2016) 发现企业跨国并购会使东道国企业创新活动减少,带来生产率的下降。^④

企业加成率也是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叶生洪等 (2016) 利用 1999—2007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对跨国并购对东道国企业竞争力(以企业加成率来衡量)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实证部分用倍差法消除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并用分位数回归法得到外资并购对企业加成率条件分布的影响,同时对间接溢出效应进行考虑。实证结果表明,外资并购对小规模企业的竞争力有抑制作用,对大规模企业的竞争力存在短期促进作用、长期抑制作用。^⑤

FDI 还会影响东道国的出口。Liu et al. (2016) 认为中国海外并购可以通过三个渠道改变被收购方出口决策。(1) 降低固定成本,帮助被收购企业免除出口固定成本,增加被收购方出口。(2) 转让技术,提高被收购企业生产率,增加被收购方出口。(3) 全球市场重组,如果被收购方的贸易成本相对于收购方足够小时,被收购方就会替代收购方进行出口;如果收购方的贸易成本相对于被收购方足够小时,被收购方会退出出口市场。作者进一步基于 2000 - 2006 年的企业层面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发现全球市场重组和固定成本下降显著增加出口,而技术转让对出口没有显著影响。^⑥

除了对出口规模的影响外,FDI 还会对东道国贸易条件产生影响。Wacker (2016) 基于 1980 - 2008 年 50 多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发现 FDI 流入有利于改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并且对历史文化悠久的国家更为显著。作者还发现,相比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FDI 对相对封闭国家的贸易条件改善有较明显的促进作用。^⑦

① Jude, C. (2016). Technology Spillovers from FDI. Evidence on the Intensity of Different Spillover Channels. *The World Economy*, 39 (12), 1947 - 1973.

② Ashraf, A., Herzer, D. & Nunnenkamp, P. (2016). The Effects of Greenfield FDI and Cross-border M&As 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he World Economy*, 39 (11), 1728 - 1755.

③ Hong, J., Sun, X. & Huang, W. (2016). Local Institution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Productivity of Domestic Firms.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 (1), 25 - 38.

④ Stiebale, J. (2016). Cross-border M&As and innovative activity of acquiring and target firm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99, 1 - 15.

⑤ 叶生洪、王开玉和孙一平 (2016): “跨国并购对东道国企业竞争力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国际贸易问题》,第 1 期,第 50 - 59 页。

⑥ Liu, Q., Qiu, L. D. & Li, Z. (2016). Foreign Acquisitions in China and Multinationals' Global Market Strategy.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 (1), 87 - 100.

⑦ Wacker, K. M. (2016). Do Multinationals Deteriorate Developing Countries' Export Prices? The Impact of FDI on Net Barter Terms of Trade. *The World Economy*, 39 (12), 1974 - 1999.

(三) 劳动力市场和社会福利

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工资、人力资本的影响一直是发展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的研究热点。外商直接投资有助于增加东道国国内的劳动力需求 (Latorre, 2016)。^① Chen et al. (2016)^② 基于 1998 - 2007 年中国企业层面的数据, 并将就业弹性分为就业的工资弹性、就业的资本弹性和就业的产出弹性^③。由于行业的异质性和企业的不同生产、销售模式, FDI 对就业弹性会有不同影响。研究发现, 由于劳动密集型 FDI 更倾向于流入存在廉价劳动力和规模经济的东道国, 即使东道国工资上涨, 仍然会低于母国工资水平。因此, 劳动密集型 FDI 的工资弹性较低, 但面对资本投入或产出冲击时, 规模经济的变化对就业产生显著影响, 即劳动密集型 FDI 有较高的产出弹性和资本弹性。

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提升国内人力资本和工资水平等方式, 促进劳动者收入增加, 具有减贫效应, 但可能带来贫富差距扩大。葛顺奇等 (2016) 利用中国 2007 年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和国家统计局工业企业数据, 发现 FDI 总体上提升了中国居民生活水平, 对减贫有正向作用。从 FDI 类型来看, 内销型 FDI 由于与国内市场关联性更强, 减贫效应最强, 明显高于一般出口企业。从来源地来看, 港澳台地区 FDI 来源比较复杂, 大多倾向于规避贸易壁垒, 对国内就业和收入的影响较小, 因此减贫效应相对较弱。^④ 但 McLaren & Yoo (2016) 利用 1989 - 2009 年越南人口普查数据, 发现如果一个家庭的成员没有被外国企业所雇佣, 那么 FDI 的流入会带来家庭生活水平的轻微下降, 只有家庭成员被外国企业所雇佣的家庭才能得到适度收益。作者还发现, 人口会大量流向 FDI 流入的省份。^⑤

FDI 对居民福利的影响。现有研究对于 FDI 的福利效应仅仅是从 FDI 对东道国某一层面的影响来考察的, 缺乏一个测度国民福利的有效代理变量。王修华等 (2016) 利用 2008 年和 2010 年 CGSS 数据, 以居民主观幸福感为代理变量, 实证研究了 FDI 对中国居民福利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 FDI 显著促进了中国居民福利的提高, 并通过三个机制影响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第一, FDI 的流入带来了高素质劳动力、先进的管理经验以及技术, 提高了本地企业效率并增加了居民收入, 因而提高了居民的主观幸福感, 即 FDI 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提高主观幸福感。第二, FDI 的流入使得劳动力能更好的在各个地区间流动, 缩小了居民的收入差距, 因而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得到了提升, 即 FDI 通过减小收入差距来提升居民整体的主观幸福感。第三, FDI 通过技术溢出给国内企业带来了先进的技术, 减少了国内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污染, 使环境得到了改善, 提高了居民主观幸福感, 即 FDI 通过减少环境污染提高居民的

① Latorre, M. C. (2016). A CGE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ariff Reform on Female and Male Workers in Tanzania. *World Development*, 77, 346 - 366.

② Chen, B., Li, Y. & Yin, Y. (2016). FDI, Industry Heterogeneity and Employment Elasticity in China.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 (1), 189 - 200.

③ 分别为工资每变化一个百分点所对应的就业数量变化的百分比; 资本每变化一个百分点所对应的就业数量变化的百分比; 产出每变化一个百分点所对应的就业数量变化的百分比。

④ 葛顺奇、刘晨和罗伟 (2016): “外商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 基于流动人口的微观分析”, 《国际贸易问题》, 第 1 期, 第 82 - 92 页。

⑤ McLaren, J. & Yoo, M. (2016). FDI and Inequality in Vietnam: An Approach with Census Data. NBER Working Paper No. 22930.

主观幸福感。作者进一步考察了政府质量在 FDI 福利效应中产生的影响,发现在政府质量较高的地区,政府通过提供更好的公共治理吸引优质 FDI 的流入,从而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在政府质量较低的地区,FDI 能显著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弥补政府质量较低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带来的损失。在政府质量中等的地区,FDI 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①

(四) 投资与增长

不少学者研究 FDI 与东道国国内投资之间的关系,认为 FDI 流入会增加消费支出、降低国内储蓄,从而使国内投资减少。另一些学者认为 FDI 通过产业连锁效应、示范效应与牵动效应导致国内投资增加。Farla et al. (2016) 研究了国家治理在 FDI 对东道国投资影响中所扮演的作用。作者认为从理论上讲,国家治理影响 FDI 对国内投资促进作用的机制有两个。一是技术外溢。技术溢出效应取决于国内市场发展和制度发展,而不好的国家治理对 FDI 对国内投资的促进作用产生负面影响。二是寻租行为。寻租行为通常与不完善的国家治理相关,从而抑制 FDI 对国内投资促进作用。作者进一步使用 1996 - 2009 年间 46 个发展中国家的年度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 FDI 对国内总投资水平产生积极促进作用,而良好的国家治理在其中扮演较弱的正向影响,通过减少寻租行为导致 FDI 更好的促进国内投资。^② 然而,由于在进行实证研究时,很难将国外资本形成从国内资本形成中分离出来,并且使用 GMM 方法时会受到方法学问题的严重影响, Morrissey & Udomkerdmongkol (2016) 基于同样的数据,却发现 FDI 对国内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即减少私人投资。^③

FDI 还有利于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Liu (2016) 利用 1970 - 2007 年间 92 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发现 FDI 能同时促进高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金融作为重要基础设施,在 FDI 和经济增长之间扮演了重要角色。大多数学者认为,FDI 对金融市场较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但是缺乏对 FDI 和金融市场发展相互作用的研究。^④ Otchere et al. (2016) 发现 FDI 可以推动金融市场改革,提高金融市场的透明度和深度。同时,运作良好的金融市场可以促进外资更有效地流向生产部门,为投资者创造更多的价值。因此,作者认为 FDI 和金融市场发展是相互影响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控制三者间内生性的情况下,FDI 促进非洲经济的增长。^⑤

① 王修华、谷溪和王海成 (2016): “外商直接投资究竟是‘天使’还是‘魔鬼’——基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再审视”,《国际贸易问题》,第 11 期,第 143 - 153 页。

② Farla, K., de Crombrughe, D. & Verspagen, B. (2016). Institution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Domestic Investment: Crowding Out or Crowding In? *World Development*, 88, 1 - 9.

③ Morrissey, O. & Udomkerdmongkol, M. (2016). Response to ‘Institution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Domestic Investment: Crowding Out or Crowding In?’ . *World Development*, 88, 10 - 11.

④ Liu, W. (2016).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FDI, R&D and Economic Growth: A Cross-country Empirical Analysis. *The World Economy*, 39 (7), 983 - 1004.

⑤ Otchere, I., Soumar, I. & Yourougou, P. (2016). FDI and Financial Market Development in Africa. *The World Economy*, 39 (5), 651 - 678.

四、绩效

2016年国际直接投资绩效的研究主要从外企撤资的动因、企业跨国并购成败影响因素两个大的方面进行分析。

外企撤资反映出跨国公司通过在全球范围内调整经营战略来提高企业绩效。李玉梅等(2016)利用东部沿海地区10个城市外资企业在2013-2014年间的调研数据,对影响外企撤资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显示,样本期间撤资比例为22.17%,子公司经营状况越好,撤资的可能性越小。外企母公司全球化程度、多元化程度越高、竞争力越强,撤资的可能性越大。东道国投资环境对外企越有利,撤资的可能性越小。行业发展前景越好,撤资的可能性越小。进一步分析发现,投资环境对投资决策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子公司经营状况。作者通过投资环境因子载荷系数^①进行分析,发现外资优惠政策和生产要素成本因子的载荷系数最高,这说明政策寻求型和成本寻求型FDI是外资撤资的主力,撤出的外资主要是传统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FDI。而行业内竞争加剧是导致市场寻求型外企撤资的因素。^②

跨国公司的撤资决策不仅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还与自身特点有关。Blanchard et al.(2016)基于比利时1997-2008年企业层面数据,使用Probit模型并将企业退出决策的内生因素考虑在内,对跨国公司和国内企业的退出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由于自身规模、生产率、沉没成本等特征,跨国公司比国内企业有着更高的退出概率。此外,作者还发现,由于跨国公司可将部分有形和无形资产转移到其他关联公司,因此对沉没成本和公司规模的敏感度低于国内企业,有较低的退出障碍。^③

根据汤姆森并购数据库,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失败率远高于欧美企业。已有不少国内学者对影响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成功率的因素进行研究。贾镜渝、李文(2016)基于汤姆森数据库1987-2014年中国跨国并购数据,将距离分为正式制度距离和知识距离,研究分析了距离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成功率的影响。正式制度距离对企业并购成功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知识距离对企业并购成功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④杨波等(2016)发现1997-2014年中国非国有企业的并购成功率较高。此外,控股比例、东道国产业保护水平、经济发展程度较高时,海外并购的成功率较低。企业并购经验则对并购成功率产生正向影响。对这些因素与企业所有制因素的相互影响进一步分析,作者发现,企业并购经验较丰富及控股比例较高时,企业所有制对并购成功率的负面影响会减弱。而东道国产业保护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企业所有制对并购成功率的负面影响会减弱。^⑤

政治和文化是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成败的两大重要因素。李诗、吴超鹏(2016)基于

① 表示和因子的相关程度,值越接近1相关度越高。

② 李玉梅、刘雪娇和杨立卓(2016):“外商投资企业撤资:动因与影响机理——基于东部沿海10个城市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管理世界》,第4期,第37-51页。

③ Blanchard, P., Dhyne, E., Fuss, C. & Mathieu, C. (2016). (Not So) Easy Come, (Still) Easy Go? Footloose Multinationals Revisited. *The World Economy*, 39 (5), 679-707.

④ 贾镜渝、李文(2016):“距离、战略动机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成败——基于制度和跳板理论”,《南开管理评论》,第6期,第122-132页。

⑤ 杨波、张佳琦、吴晨(2016):“企业所有制能否影响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成败”,《国际贸易问题》,第7期,第97-108页。

1997 - 2010 年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案例发现, 一是当被收购公司属于东道国政治敏感性行业, 即属于国防、金融、战略资源及电讯行业时,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成功率较低。二是友好的外交关系能弥补政治敏感性资产对并购产生的影响, 带来海外并购成功率的提高。三是较高的东道国民众诚信度^①有利于与中国企业建立互信关系, 提高跨国并购的成功率。四是两国历史交战次数对并购成功率产生负向影响。^② 杨连星等 (2016) 使用 2005 - 2014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层面数据, 发现友好双边政治关系有助于提高企业投资成功率。与长期性的正式外交关系相比, 短期性的高层互访和非正式的友好城市交流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对外投资成功率。相反, 双边政治冲突则对企业投资成功率的提高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对不同行业中的双边政治关系进行研究, 发现友好双边政治关系对资源获取型行业投资成功率的提高有积极作用, 而双边政治关系没有对基础设施行业投资成功率的提升产生显著促进作用。^③

企业可以通过学习效应降低投资风险、提高企业管理水平, 从而提高投资绩效。范黎波等 (2016) 基于 1982 - 2012 年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数据, 实证研究了中国企业学习效应对其跨国并购成功率的影响。研究发现, 自身和同行业其他企业跨国并购成功经验有助于提高企业并购成功率。企业自身失败经验对并购成功率的影响呈“U”型, 而企业会受到同行业其他企业失败经验的负向影响, 即随着同行业其他企业失败经验的增加, 企业并购成功率减小。^④

金融危机与政府干预会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产生重要影响。徐晓慧、李杰 (2016) 认为金融危机和政府干预均会影响企业并购绩效。其中金融危机通过改变企业并购动机和交易特征, 在金融危机负向需求冲击下, 通过协同生产来降低企业运营成本, 提升企业跨国并购绩效。政府干预包括政府直接干预和政府间接干预。直接干预即政府通过政策的作用影响并购。间接干预表现为政府通过国有企业影响跨国并购。作者将金融危机前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超额收益作为投资绩效的衡量指标, 采用单因素和双因素市场模型对超额收益进行评估, 发现金融危机有利于提升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绩效。作者将金融危机期间分为三个阶段: 金融危机爆发初期、金融危机持续发展以及金融危机减弱、经济开始复苏时期, 对企业跨国并购绩效在不同金融危机阶段的提升幅度进行分析。计量结果显示, 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的提升幅度呈“N”型, 即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作者还发现, 金融危机前, 政府直接干预与间接干预均对企业并购绩效无显著影响, 而在金融危机之后, 政府直接干预与间接干预对企业并购绩效的提升有积极作用, 其中受政府直接干预强度最大的企业作用最显著。^⑤

区域贸易协定是在国际贸易中为了消除各种贸易壁垒而缔结的国际条约, 对母国投资绩效存在一定影响。周大鹏 (2016) 从区域贸易协定的竞争中立和国有企业议题、投资准入议题、知识产权议题以及劳工保护议题角度, 考察了区域贸易协定对中国 ODI 制造企业母公司

① 基于 2006 年美国《读者文献》杂志在世界 32 个国家最繁华城市进行的“全球诚信测试”的结果而构成, 以该国遗失手机的归还比例来衡量该国国民的诚信度。

② 李诗、吴超鹏 (2016):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成败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政治和文化视角”, 《南开管理评论》, 第 3 期, 第 18 - 30 页。

③ 杨连星、刘晓光、张杰 (2016): “双边政治关系如何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二元边际和投资成败视角”, 《中国工业经济》, 第 11 期, 第 56 - 72 页。

④ 范黎波、马聪聪、周英超 (2016):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学习效应的实证研究——经验学习和替代学习的视角”, 《财贸经济》, 第 10 期, 第 102 - 116 页。

⑤ 徐晓慧、李杰 (2016): “金融危机、政府干预与企业跨国并购绩效”, 《国际贸易问题》, 第 6 期, 第 167 - 176 页。

投资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对母公司绩效具有负向影响,即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越高,中国制造企业 ODI 母公司绩效越低。劳工标准对母公司绩效具有正向影响,即劳动自由度越高,中国制造企业 ODI 母公司绩效越高。国企属性以及东道国投资自由化水平对中国海外投资制造企业母公司绩效影响则不显著。^①

海外投资模式的选择影响投资成败,受到东道国的特质和 ODI 企业自身情况的影响。黄凌云、王军(2016)基于中国 10902 家 ODI 企业层面数据,发现东道国工程建设速度越快,选择独资兼并越有利;东道国经济高速增长和市场规模庞大时,选择合资模式(合资绿地或合资兼并)更有利;东道国的经济开放程度越高,选择独资兼并更有利;东道国市场竞争越激烈,应采用独资形式。合资兼并的模式大大降低了企业的劳动产出,独资绿地和独资兼并的模式使企业员工的工资最高,而投资模式对劳动者福利没有显著影响。^②

五、全球投资治理

2016 年全球投资治理的研究主要从双边层面、区域层面以及全球层面的国际投资治理进行展开。具体而言,双边层面主要包括 BITs 签署的影响因素以及对东道国国内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在区域层面上,具有投资章程的自由贸易协定、区域一体化协定形成对 BITs 的有效补充。在全球层面上,G20 有望在国际投资治理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目前,双边投资协定(BITs)是国际投资治理的主要手段,已有不少学者研究了 BITs 签署的影响因素。Chilton(2016)使用定性和定量分析来考察美国 BITs 签署的动因。定性分析表明,美国行政部门的官员认为 BITs 签署是巩固和加强与重要国家间政治关系的途径。定量分析表明,投资动机(如贸易和 FDI)与美国 BIT 呈弱相关,而政治动机(如军事援助)与美国 BIT 呈强相关。因此,作者认为政治动机是美国 BITs 签署的主要动因。^③ Cho et al.(2016)通过建立游戏理论模型,考察了资本输入国的政府和资本输出国的投资者在战略上的相互影响,并采用 Cox 比例风险模型进行检验。结果显示,一方面,当东道国高度重视 FDI 时,BITs 签署的可能性随司法机构信誉的缺失而增加。另一方面,当东道国对 FDI 的需求偏好适中时,BITs 签署的可能性随司法机构信誉的提高而增加。^④ Betz & Kerner(2016)认为资本短缺是 BIT 签署的重要驱动力,具体表现在美国高利率和对外金融负债净值使国外资本对政府的吸引力增加,从而促使 BIT 签署。^⑤

BITs 对东道国国内的经济和政治都产生影响。在经济方面,双边投资协定通过两国政策安排方式降低了投资风险和成本,有利于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杨宏恩等(2016)利用

① 周大鹏(2016):“区域贸易协定对中国 ODI 制造企业母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国际贸易问题》,第 3 期,第 70-80 页。

② 黄凌云、王军(2016):“中国对外投资企业跨国投资模式选择及其对劳动者的影响”,《国际贸易问题》,第 6 期,第 130-142 页。

③ Chilton, A. S. (2016). The political motiv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program.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3 (4), 614-642.

④ Cho, S., Kim, Y. K. & Lee, C. (2016). Credibility, preferences, and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11 (1), 25-58.

⑤ Betz, T. & Kerner, A. (2016). The influence of interest: Real US interest rates and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11 (4), 419-448.

2003 - 2013 年中国与 109 个国家的 ODI 数据, 发现 BITs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东道国在制度上的不足, 降低投资企业所面临的违约等风险。^① Colen et al. (2016) 将在前苏联和中东欧进行投资的 13 个国家分为七个领域, 研究分析了 BITs 在不同投资领域所产生的异质效应。研究发现, BITs 能增加投资于公共事业和房地产领域 FDI 的流入, 而对投资于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的 FDI 没有影响。同时, BITs 在征收风险较大的部门更能吸引 FDI 流入。^② 在政治影响方面, Mazumder (2016) 利用 1965 - 2011 年发展中国家数据, 发现 BITs 使国内外产权环境相互隔离, 导致国内产权环境停滞。在独裁政权中, 停滞不前的国内产权制度使能够继续抑制 SMEs 发展的国内商业精英受益。然而, 随着国家民主化程度提高, 这类收益减少。^③

除了双边层面的全球投资治理外, 区域层面具有投资章程的自由贸易协定、区域一体化协定形成对 BITs 的有效补充。Dixon & Haslam (2016) 将全面的国际投资协定^④纳入分析, 研究了拉丁美洲与发达国家签订的国际投资协定对拉丁美洲 FDI 流入的影响, 结果显示, 当国际贸易和强大的国际投资协议相结合时, 投资保护的质量得到了显著提高, 它们对拉丁美洲的 FDI 流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⑤ Chornyi et al. (2016) 通过考察在 2015 年 12 月 31 日之前通告 WTO 的 260 个区域贸易协定中的投资条款, 研究了区域贸易协定 (RTAs) 投资自由化和保护的实现方式。^⑥

在全球层面上, G20 在国际投资治理领域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韩冰 (2016) 对 G20 成员在国际投资治理领域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提出要加强 G20 成员的沟通与协调, 积极寻找 G20 成员在国际投资体系改革方面的共同利益点。^⑦ Sauvart (2016) 提出中国作为 2016 年 G20 主席国应将国际投资治理议题纳入 G20, 为多边投资协定奠定基础。事实上, 中国推动发布了《G20 全球投资政策指导原则》。^⑧ 詹晓宁 (2016) 结合其工作实践, 进行了解读。作者还提出未来全球投资治理的新途径“双轨渐进模式”, 即分板块建立新的全球投资框架和现行国际投资体制改革。^⑨

中国在世界经济贸易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全球权力与规则的调整势必发生, 因此全球贸易投资规则重建是中国在世界舞台上面临的又一大挑战。Chin (2016) 指出创建亚投行是

① 杨宏恩、孟庆强、王晶、李浩 (2016): “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基于投资协定异质性的视角”, 《管理世界》, 第 4 期, 第 24 - 36 页。

② Colen, L., Persyn, D. & Guariso, A. (2016).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and FDI: Does the Sector Matter? *World Development*, 83, 193 - 206.

③ Mazumder, S. (2016). Can I stay a BIT longer? The effect of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on political surviva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11 (4), 477 - 521.

④ 双边投资协定、具有投资章程的自由贸易协定、区域一体化协定等。

⑤ Dixon, J. & Haslam, P. A. (2016). Does the Quality of Investment Protection Affect FDI Flows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Evidence from Latin America. *The World Economy*, 39 (8), 1080 - 1108.

⑥ Chornyi, V., Nerushay, M. & Crawford, J. (2016). A Survey of Investment Provisions in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WTO working paper ERS - 2016 - 07.

⑦ 韩冰 (2016): “二十国集团在国际投资领域的合作与前景展望”, 《国际经济评论》, 第 4 期, 第 53 - 66、5 页。

⑧ Sauvart, K. P. (2016). China, the G20 and th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Regime (pages China, the G20 and th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Regime. *China and World Economy*, 24 (4), 73 - 92.

⑨ 詹晓宁 (2016): “全球投资治理新路径——解读《G20 全球投资政策指导原则》”, 《世界经济与政治》, 第 10 期, 第 4 - 18、155 页。

全球投资治理的重要发展,反映了世界经济实力平衡的关键转变。^①金中夏(2016)考察了美国引领的一系列区域自贸谈判及其新的规则给中国带来的挑战。作者提出,中国在保证自身利益的前提下,需要加快推进以及积极参与国际贸易投资规则重建,实行区域、双边和多边并重的对外开放战略。作者还认为,中美作为全球经济的两大巨头国家,双方的发展不应只关注自身利益,应基于经济发展规律,以互相信任、互相适应、互相开放这一模式推进国际贸易投资规则重建。^②

六、海外利益保护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需要重视社会组织风险。东道国的社会组织风险不仅会带来投资的损失,还会给中国对外经济战略的实施及国家形象带来负面影响。孙海泳(2016)发现,东道国国内政治因素、环保因素、维权诉求、外部势力的影响以及中国企业自身不足是社会组织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作者提出,中国企业需强化投资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重视与东道国社会组织的沟通、协调,同时还需充分利用东道国的社会资源,降低投资项目的风险。^③柳建文(2016)也从国内国际两个层面,分析了东道国非政府组织如何干扰中国的区域合作,并建议中国企业扩大社会责任投资。^④

美国的历史经验可以给如今的大国如何实现自身利益带来借鉴意义。黄琪轩(2016)比较了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不同对外经济战略给德国带来的不同影响。一战后,由于美国罔顾大国间利益的关联性,坚持要求英法等欧洲国家偿付战争债务,造成国际秩序混乱,使德国极端政治势力发展壮大,同时美国也未能收回债务。二战后,美国关照大国间关联利益,免除战争债务、通过马歇尔计划等实施大规模援助,重建了战后国际秩序,同时美国也得到了经济回报。因此,作者认为,现今大国的利益半径扩大,互相竞争的国家间也存在利益关联性,要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需要关注与其他国家包括竞争对手的关联利益。^⑤

七、总结

本文主要从以下六大部分分析并评述了2016年国际投资国内外学术研究文献:国际投资的决定因素,国际投资对母国的影响,国际投资对东道国的影响,国际投资的绩效,全球投资治理以及海外利益保护。其中,国际投资的决定因素、对东道国和母国的影响是研究重点。

^① Chin, G. T. (2016).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Governance Innovation and Prospects. *Global Governance*, 22 (1), 11 - 26.

^② 金中夏(2016):“中国面临全球贸易投资规则重建的重大挑战”,《国际经济评论》,第4期,第44-52、5页。

^③ 孙海泳(2016):“中国对外基础设施投资的社会组织风险及对策”,《现代国际关系》,第3期,第49-55、64页。

^④ 柳建文(2016):“‘一带一路’背景下国外非政府组织与中国的国际区域合作”,《外交评论》,第5期,第1-30页。

^⑤ 黄琪轩(2016):“对外经济战略、大国关联利益与战后秩序——两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外经济战略与德国问题”,《当代亚太》,第3期,第35-67、154-155页。

相关文献涵盖的主要理论包括国际贸易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内生增长理论、交易成本经济学和产权理论等,同时还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切入,这是一个较有新意的研究视角^①。

纵观这六个领域的文献,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1) 国际投资的决定因素文献中,占据主体的是制度因素对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跨国企业往往选择制度质量较高的国家或地区,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大量分布于风险较高的国家,具有“风险偏好”特征。这可能主要是由于中国 ODI 更多地流向自然资源丰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或地区。

(2) 国际投资对母国的影响文献中,贸易是关注的重点,ODI 与出口是跨国公司拓展海外市场的两种重要方式。ODI 通过影响出口规模、出口产品质量、成本加成率和贸易结构对母国出口整体产生影响。

(3) 国际投资对东道国的影响文献中,国际投资可以通过竞争效应、示范效应以及改变东道国经济环境等效应对东道国企业生产率产生正向溢出,但这些效应的发挥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使得 FDI 对东道国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是复杂的。

(4) 国际投资的绩效文献中,外企撤资反映出跨国公司通过在全球范围内调整经营战略来提高企业绩效,其撤资决策受外在因素和自身特点同时决定,而中国企业由于距离、企业所有制、政治、文化等因素,其跨国并购的失败率远高于欧美企业。

(5) 全球投资治理文献中,双边投资协定是全球投资治理的主要手段,它的签署受到东道国政治动机、司法机构信誉及资本短缺驱使,同时双边投资协定给东道国国内的经济和政治都有重要影响。

(6) 海外利益保护文献中,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需要重视社会组织风险。而中国政府可以借鉴美国历史经验来找到实现自身利益的途径。

从研究方法来看,全球投资治理与海外利益保护主要是规范性研究,而前四个领域主要采用实证研究。实证研究的主要文献运用了倾向得分匹配法、倍差法、空间杜宾模型、马氏距离匹配法、CGE 模型和 GMM 模型,其中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倍差法较为常用。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得到对照组,可以解决自选择问题引起的内生性,倍差法也可消除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在未来的研究中,国际投资国内外学术研究将会对现有研究的不足及争议之处进行研究探讨。从 2016 年的研究文献来看,大部分文献都是基于企业微观层面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对企业生产率、制度因素的研究是历来研究的热点,但在这方面上提出新的创新难度较大。对投资绩效、全球投资治理、海外利益保护的研究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但相关的数据存在缺陷,需要学者拥有丰富的研究经验。

^① 例如, Suwandi, I & Foster, J. B. (2016).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Monopoly Capital: From the 1960s to the Present. *Monthly Review*, 68 (3), 114 - 131.